



宝塔山下的思想淬火

——延安整风运动

■杜献洲

太行西望，天地浩瀚，万壑交错，一座千年古城——延安雄踞于此。

1937年1月13日，这座沉寂的山城，彩旗飘扬，沿街贴满了“欢迎抗日领袖”等标语。数千群众冒着严寒，热烈欢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进驻。

延安，是革命圣地，也是中国共产党浴火重生之地。1941年5月，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。

习主席指出，党通过延安整风，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，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。

三年整风，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巍巍宝塔山，见证了刻骨铭心的思想淬炼，见证了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，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。



圣地厚土（中国画局部）

李建军作

量，很多人将“实事求是”“调查研究”“依靠群众”当成一生的座右铭；

——延安整风，使广大党员的党性得到淬炼，“紧紧地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，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”成为坚定的信念；

……

曾任新四军第7师师长的张鼎丞回忆，那年，当自己“回到华中前线时，看到分别六年之久的新四军部队，如同全国党所领导的军队一样，经过整风运动，无论在军事和政治素质上，都有很大的提高，某些干部在工作中的军阀主义残余和教条主义倾向，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克服，官兵之间、上下级之间，经过了认真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，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，大大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……人人都以崭新的姿态，准备迎接大反攻的到来”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到延安后，人们扛起秧歌，欢呼雀跃，把衣服和帽子抛向天空。

破碎山河终修复，胜利欢歌动古今。抗战胜利，洗雪了近代中国百年之耻，并成为时代的转折点。

1947年9月，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上说，现在共产党力量增强，“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展的”；整风使中共养成了“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办事方法”，并“运用于组织、宣传、训练与作战”，这是共产党训练“最大的成功”。他公开提出，研究延安整风以改造国民党。

解放战争中，人民军队摧枯拉朽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，蒋介石最终无法改造腐朽的国民党。

30多年后，邓小平同志指出：“没有那次整风，打败日本侵略者，打败蒋介石，是不可能的。”

四

静静的窑洞、竖排的著作、泛黄的笔记……在诉说着一个思想升华的年代。“几回梦回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”，是老前辈们的真挚情感。

几十年后，许多老革命写下回忆文章，以《世界观改造的起点》《延安整风对我一生的影响》《在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》等为题，表达了对这段历史的难忘回忆。

延安整风运动过去80多年了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情系延安，始终把作风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

春去秋来，时序更新。放眼全球，乱云飞渡。捍卫和平，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人民军队任重道远、挑战重重。

优良作风塑造英雄部队。新征程上，全军部队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，以铁规铁纪锻造胜战“铁军”。

学术支持：褚银
版式设计：方汉、杨磊、贾国梁



四个字才重新恢复原样。这四个大字，穿越时空，魅力无穷，至今仍光芒四射。

二

翻山越岭，轻装疾行，勇闯封锁线。为接受党性淬炼，数千名党员干部，从全国各抗日根据地、国统区和敌占区出发，奔赴延安。有的跋涉半年以上，有的牺牲在途中……

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、中级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。毛泽东说，“犯思想病最顽固的”是高级干部中的人，“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，下级的干部就进步快了”。

“脱胎换骨”——这是回忆延安整风文章中的高频词。整风中，党员干部认真学习22个整风文件，对照文件精神，集体讨论，严格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改造思想，其过程必然是痛苦的。尤其是被批评的时候，“总有些不舒服和难过”。有的同志十三四岁就参加红军，认为自己是“自来红”，对整风有些不理解。

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杨植霖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一开始听到改造二字很感刺耳，我自己就觉得搞了许多年革命，坐过牢、打过游击，到头来怎么还得改造……但是拿无产阶级思想、党的要求一对照，又觉得很应该改造……每一个真革命同志都应该欢迎思想改造，特别欢迎别人帮助自己思想改造。”

杨植霖曾任八路军绥蒙游击大队政委，在大青山开展抗日游击战，有时连续几个月马不卸鞍、抱枪而眠。学习讨论中，有位同志批评他有“单纯军事观点”。他一时接受不了，“我一心一意为党搞军队，怎么有单纯军事观点？”那位同志又说：“你只闹了那几杆枪，为什么不发展党？不发动群众……”

“我当时几乎哭出来了，好几天闷闷不乐。后来通过学习，越来越觉得人家说到我的病根儿上，觉得这是同志之间诚心诚意地帮助，一生也感激不尽”。

抛头颅、洒热血，鏖战强敌，还要改造思想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么崇高的精神追求，所以能战

胜强大的敌人。

1944年4月，在第129师和晋冀鲁豫区干部座谈会上，刘伯承作《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》，既肯定了成绩，也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的缺点。他指出，在百团大战前后，由于对“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，过分强调正规军，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”，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。

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，无论战功多么显赫，都把自己看成普通党员，勇于揭短亮丑，为全党全军立起了严于律己的表率。

1944年1月，在华中领导抗日的陈毅，给毛泽东写信，汇报自己的收获：“这几年整风，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，作大度的自我批评……只有自我批评……才是于党于己有益的办法”。

毛泽东收信后，“越看越高兴”，便回信鼓励：“随时准备坚持真理，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，没有什么行不通的。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，只要有几十个领导干部，打通了这个关节，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。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益成熟了，看各地也报就可以明了。”

“整个党在政治上日益成熟”——这是整个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境界的升华。

三

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”“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，学习好了，现在可以对付黑暗，将来可以迎接光明……创造新世界”。这是毛泽东在酝酿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期望，历史也证明了这个预测。

——延安整风，从中央到各地均成立高级学习组，集中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；

——延安整风，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，并变成克敌制胜的巨大力

1921年7月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，从嘉兴南湖启航，一路探索，百折不挠。

从南湖到延安，十几年风雨兼程，有南昌城头的“首义”，有“星星之火”的创举，有突破重围的转折，也有损失惨重的“左”倾、右倾“偏向”。

尤其是1933年，博古、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，使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极点。广昌战役中，他们命令“无炮兵，步、机枪子弹很少”的红军，学“欧洲的城市保卫战”，同装备飞机、大炮的敌人打“堡垒战”，伤亡达5000多人。他们不了解红军的优势，照搬外军经验，直接造成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断送了中央苏区和大量中央红军。

遵义会议后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，但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，并未来得及从思想上清理，“它们还经常作怪，经常袭击我们”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我党发展突飞猛进。到1942年初，党员从3万多增至80多万，党领导的军队（包括游击队）达57万。

广大新党员虽然有高度的革命热情，但没有经过内战，没有参加过长征，对党的理论、党的纲领、党的历史等知之甚少。一些农村党员，脑子里还存有“绿林好汉”的思想；有的知识分子党员，内心里看不起劳动人民……

面对老、新党员的思想实际，党中央着眼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大局，高瞻远瞩，筹划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，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“在思想上准备胜利”。

恩格斯指出，“要明确地懂得理论，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，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”。

1941年5月，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报告，对危害极大的主观主义作了犀利分析，并用一副对联画了像：“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；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。”

“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，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”“洋八股必须废止，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，教条主义必须休息，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”。1942年2月，毛泽东相继作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》（即《整顿党的作风》）《反对党八股》的演讲。

一篇篇耳目一新、启迪人心的演讲，“好像巨石击水，引起强烈反响”，也开启了全党整风运动。现场聆听的同志说，毛泽东讲话如“开水洗冰”，有“说不出的痛快”。

整风运动的主题是反对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党八股，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。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，是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。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“左”倾、右倾错误，从思想来源说都是主观主义，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。要克服主观主义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实事求是。

“实事求是”——这也是毛泽东亲笔给延安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，嵌在大礼堂山墙上。1947年，国民党军进犯延安时，中央党校遭到破坏，老乡悄悄地把这四个字的刻石藏起来，直到1948年后，这